

中日邦交正常化 研究

Studies in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胡鸣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日邦交正常化 研究

Studies in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胡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胡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7264 - 3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研究 IV. ①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87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201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2012年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读后感言(代序)

受胡鸣博士之托，花了一周时间读完了她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书稿。说实在的，我是抱着审读与拜读的两种心情去读的。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亲历者，我自以为对这个题目我会比这位年轻学者了解得更多、更准确些，同时，我也想从她的书稿中有新的发现和收获。因为她告诉我，这部书稿是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搜集材料和开始构思的，回国后她又一直在补充修改，可谓是一部身心贯注之大作。

读完之后，不禁感到由衷的惊喜，并觉得颇有收获，不由地发出“后生可畏”的惊叹，真没想到一个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还在幼儿园里玩耍的萌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内国际背景、中日邦交谈判的经过和症结所在，以及周恩来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快刀斩乱麻、一气呵成的外交伟业，竟研究得那么深入，把握得那么准确，于是生出三点感受，正是通常所说的“读后感”。

其一，我认为胡鸣博士作为一个学者的治学态度是很认真严谨的。她不惜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了中国与日本两种资源。她并不满足于查阅两国的档案、当时相关的媒体报道、两国官员和学者的著述，还下定决心去了解第一手材料。为此，她四处奔波，多方探询，在日本东京、大阪，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锲而不舍地访谈了当时在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外交官和民间人士等两国多名亲历者。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死”材料，还从掌握第一手枢密的人员口中获取了宝贵的“活”材料，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研究考证。这才可能使她的论据更加充分，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且通篇书稿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令人读来毫无艰涩之感。

其二，胡鸣博士在研究、考证、分析上狠下功夫，使其书稿更具有学术性，其价值超过了一般记叙性著作。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周恩来的关

系，迄今两国的专家学者和外交界人士有不少著述中都有所涉猎，而胡鸣博士书稿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多个岁月里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巨大努力和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论定了周恩来在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决策者、指挥者和实践者这三位一体的角色担当，周恩来的对日外交思想蕴含在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思想和新中国的对日政策方针中，他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原则性指示是既忠诚又创新，他的一系列对日外交活动，诠释了他作为伟大外交家的智慧、品格和作风。令我耳目一新的是，胡鸣博士还从周恩来的人生经历和心旅路程，探究他的对日政策思想的形成脉络。虽说书中所言之是非正误，有待读者和研究家们评点，但是，这无疑是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也是学术研究的新尝试，体现了作者的开拓性。

其三，从胡鸣博士的书稿中，我感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40 余年的今天，她作为新生代的中日关系问题学者，仍执着地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段历史的研究，一定是意识到中日关系空前严峻的现实状况，意欲从历史的研究中找寻出中日间现实问题产生的缘由。如中国放弃战争赔偿问题、历史问题，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等。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提出上述问题，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应该提倡的。因为科学的求索精神是学术研究水平提升的动力。当今中国学术界气氛活跃、百家齐鸣，这正是我们伟大时代科学繁荣昌明的反映。

关于中日两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随着中日之间矛盾和摩擦的显在化，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些重新审视和评估周恩来主持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声音，甚至出现了极端的否定论。对此，在这里我只想说两句话：一是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杰作。同时，我也以为，学术讨论的深入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 and 认识那段历史，更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对日政策，也可使至今仍构成我国对日政策核心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对日政策思想，在我国学术界继续传承，并得到新生代学者的认同和发扬。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大阪总领事（大使衔） 王泰平

2014 年 11 月 20 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章	(1)
第一节 先行研究的介绍与评价	(4)
第二节 本书的重点问题	(12)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	(17)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本书的构成	(20)
第一章 周恩来与中国的对日外交	(26)
第一节 周恩来在对日外交上的角色变迁	(27)
第二节 周恩来的日本观	(38)
第三节 周恩来与日本人的交往	(57)
第二章 1949 年至 1960 年前后周恩来主导的对日外交	(65)
第一节 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形成	(65)
第二节 对鸠山内阁的外交攻势	(75)
第三节 池田内阁时代的发展	(90)
第三章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前期努力	(105)
第一节 面向日本经济界的工作	(106)
第二节 对日本社会各界的声援	(118)
第三节 对执政党及田中内阁的态度	(132)
第四节 将中国政府草案委托给竹入“密使”	(146)
第五节 构筑对日“国际包围圈”	(162)

第四章 中国国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准备工作	(166)
第一节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内外形势与中央内部的 “权力调整”	(167)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内准备工作	(176)
第三节 对国内干部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	(187)
第五章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204)
第一节 田中访华前的准备工作	(204)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	(214)
第三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227)
终 章 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	(233)
第一节 周恩来所起作用的概括	(233)
第二节 周恩来对日外交的成功与遗留问题	(236)
第三节 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启示	(241)
参考文献	(244)
后记	(249)

序 章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3年，也是日本自1945年8月战败以来的第27个年头，中日两国结束了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两国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后，中日两国政府又于1978年8月签订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于1998年12月发表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5月又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些被称作中日政府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象征着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即便从世界范围来看，中日关系也是从敌对关系转变为“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珍稀案例。

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已经走过了40余个年头，但两国间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近年来甚至出现了激烈的对立和紧张的局面。钓鱼岛问题、日本首脑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知识产权问题、食品安全等争端不断涌现，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断恶化。国民感情、经济摩擦等问题虽然都是在中日关系不断扩大过程中所出现的，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才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导致两国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常常将两国关系逼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1972年9月中日建立邦交时所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了解决中日间“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今天，对于导致中日关系不稳定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溯其源头，再次从中探寻问题的本质，并且从整个

^① 简称《中日联合声明》。

历史过程中考察问题的根源,思考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换言之,通过再次探究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两国首脑是怎样认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又是怎样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或妥协的,或许可以给建构未来的两国关系,给认识和处理中日之间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带来一些启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长达15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中国民众对日本也形成了很深的“怨恨”情感。“二战”^①结束后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日两国几乎没有政府间的正式交流,普通国民间也没有相互的交流 and 理解。但自1972年夏天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气氛迅速高涨,多年来导致两国不能改善关系和相互接近的诸多问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克服或搁置。同年7月,日本成立了新的内阁,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在2个月后的9月访问北京,仅通过四次“周恩来、田中角荣会谈”便达成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一致意见。毫无疑问,“尼克松冲击”是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但与之相比,1972年2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经过周密准备才得以实现的,并且此后经过了7年时间中美才实现建交。而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实现的速度和达成一致内容的广度方面都超过了中美建交。那么,为什么中日两国政府能够如此迅速地恢复邦交?两国又是经过了怎样的谈判过程而迅速制定出政府联合声明的?如今回首望去,还有一些未解的疑问残留在人们的心里。

关于中日两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背景及过程,至今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和考证。但似乎多为事实和过程的介绍,少有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把握。并且,关于轶闻趣事的发掘多,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背后两国人民关于中日友好的真切愿望、对双方领导人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做出的非凡努力和卓越贡献,特别是对两国领导人的想法所做的分析还显不够。中日恢复邦交与其他国家之间一般意义上的修复外交关系有着性质的不同。中日邦交正常化体现了两国人民克服自19世纪以来的齟齬、实现和平的总体意志,是经由两国领导人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的。在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吸取当初两国人民以及两国领导人所看到的历史教训,领悟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此为简称。

他们对未来的寄语。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一方面，这些研究只涉及了一部分内容，还不是很充分，并且感觉中日两国对此所做的评价稍有不同。在日本很多评价都是消极的（参照本书第四章），认为田中角荣首相之所以对恢复中日邦交转向积极，主要是为了选举，在时势推动下，国内外形势又比较有利，于是摘下了这一甜蜜果实（恢复邦交）。与此不同的是，中方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田中首相是顺应历史潮流、怀着中日不再交战和亲善友好的信念，不顾日本自民党内以及日本国内的反对意见而致力于实现对华邦交正常化，是战后^①日本外交史上少有的富有战略眼光的首相。另一方面，关于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最大动力源自中方的主动接触这一点，中日双方的研究大都表示了肯定。并且，“周四条件”的提出使得日本经济界出现了靠近中国的雪崩效应；田中内阁刚一成立，中国即派遣孙平化等负责对日工作的要员前往日本，很快建立起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渠道；中方在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期间提出了谈判草案，使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的主要反对意见减少，田中首相终于做出了访华决定等等，对于这些内容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什么异议。

但是，中方这一推进对日正常化的具体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其主要的政策制定者、推动者和实施者又是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能说很充分。“毛泽东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由周恩来总理去执行”这一说法也很普遍，但只能说这是在资料比较少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印象论的、推测式的判断。对此，笔者认为，仔细研究周恩来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理解中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所寄予的期望是不可或缺的。

2003年6月，日本《读卖新闻》社根据《情报公开法》，向日本外务省请求公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的外交资料，于是，外务省首次公开了以下资料：《田中首相、周恩来总理会谈记录（1972年9月25日—28日）——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②（共4次）、《大平外相、姬鹏飞外交部长会谈（摘要）（1972年9月26日—27日）——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③（包括

① “战后”，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同。

② 《田中総理・周恩来総理会談記録——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記録》，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公开文书整理号码01—42—1。

③ 《大平外務大臣・姫鹏飞外務部長会談（要録）——日中国交正常化交渉記録》，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公开文书整理号码01—42—2。

非公开会谈，共4次），以及被称为“竹入笔记”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记录《竹入义胜、周恩来会谈记录》^①（共3次）。以这次公开的史料为基础，结合此前已公开的史料，就为再次探究中日两国政府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双方各自的想法、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据。

第一节 先行研究的介绍与评价

一 日本学者的“中日关系”研究

研究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对战后中日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书籍仅限于中日文化比较论或是中日关系史类，且研究成果也是寥寥无几。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来理解中日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道、理解”对方的。^②80年代后期，有关中日关系的一些客观、总括性研究逐步增多，终至硕果累累。对于其中一些被高度评价的先行研究，以下将其划分通史类、综合研究类、各时代事件研究类这三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通史类

（1）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原书房，1981年版）

作者有效地利用自身新闻记者的经历、个人的采访记录以及丰富的资料，对从战后到70年代末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等进行了详细记述。是第一本有关战后中日关系的通史书，也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基础性著作。

（2）田中明彦《日中关系1945—1990》（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概述了两国关系，并围绕各时期的争论点进行了探讨，总结论述了战后45年间的中日关系。本书分别从①两国间的原动力、②国内形势、③国际形势这三个视角论述了战后中日关系。

（3）增田弘、波多野澄雄著《亚洲中的日本与中国——友好与摩擦的现代史》（山川出版社，1995年版）

^① 《竹入義勝・周恩来会談記録》，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公开文书整理号码01—298—1至01—298—2。

^② 趙全勝：《日中關係と日本の政治》，岩波書店1992年版，天儿慧执笔部分，第292页。

此书作为 14 名日本研究者的共同研究成果,从中日两国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变迁、国内政治与外交的关系、中日关系与美国、苏联、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错综复杂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4)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与中国:1945 年—1972 年》(庆应通信,1995 年版)

该书作者利用大量英美两国的文献,着眼于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环境强烈制约下所采取的政策,以及从独自的中国观出发,积极致力于打开中日关系的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对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进行了综合考察。

(5) 岛田政雄、田家农《战后日中关系五十年》(东方书店,1997 年版)

此书包括了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并按照年代具体记录了战后至 1996 年中日友好的发展历程。

(6) 中日友好协会主编《中日友好运动五十年》(东方书店,2000 年版)

记录了自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成立至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之间的中日民间交流和民间友好运动。

(7) 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 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东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依据英美日的外交文书等第一手资料,从独自的视角出发对吉田内阁、鸠山内阁和岸内阁的中国政策,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了分析,是一部研究战后日本外交史的力作。

(8)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岩波新书,2006 年版)

对从冷战时期起,经过中日邦交正常化到现在为止长达半世纪的中日两国关系进行了仔细探讨。也指出了两国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并就构建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提出了历史经验与教训。

(二) 综合研究类

(1) 冈部达味《中国的对日政策》(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 年版)

论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性格,并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有关日本的报道,严密探讨了中国的对日政策。

(2) 冈部达味编著《中国外交——政策决定的构造》(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 1983 年版)

是 7 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共同研究成果。分别从①领导层的“对外形象”的构成因素、②在联合国的演讲、③国内的新闻报道、④对外关系组织的沿革与现状等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并举出实例来推论中方外交政策形成的原因。

(3) 绪方贞子著、添谷芳秀译《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论述了 1949 年至 1987 年的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 并对中美与中日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对比分析, 指出了日美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对战后世界政治的结构性变化也进行了清楚的分析。

(三) 各时代事件类

(1) 田村重信、小枝义人、丰岛典雄著《日台断交与日中关系正常化》(南窗社, 2000 年版)

此书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日华(台湾)断交为关注点, 加入了对当时从事日本和中国台湾交涉的原大使中江要介等当事人的采访, 仔细描写了日本和中国台湾断交的来龙去脉以及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动态以及相关人员的困扰等。

(2) 王伟彬《中国与日本的外交政策》(ミネルヴァ书店, 2004 年版)

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中心, 对中日两国是基于怎样的政策来应对对方进行了考察。尤其以日本的“政经分离”政策与中国的“政经不可分”政策为中心来进行分析。

(3) 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主编《记录与考证: 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条约缔结交涉》(岩波书店, 2003 年版)

作为一本回忆录、论文集, 依据新史料与新证言, 尤其是对从 1972 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到 1978 年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之间的中日关系史进行了重新探讨, 并简要介绍了日本外务省公开的有关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进行的中日政府间交涉的新史料。

二 中国学者的“中日关系”研究

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国内政治事件的原因,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

末,中国国内仍未展开有关“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尽管进入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概观通史类的书籍,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①其中大部分为通史类,一部分加入了研究性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

(1) 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是第一本有关战后中日关系的通史书。运用国际视野来把握两国关系史,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2) 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1945年—1994年》(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战后49年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概述。作者使用了没有对外公开的外交资料,但书中并没写明出处。

(3)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由田桓主编,孙平化、肖向前、王效贤等人监修的这一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记录了1945年至1995年间中国有关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册收录了1970年之前的有关政治外交关系以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及中方资料、日方资料,另外还有有关战后中日关系方面的系列重要文献。

(4)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该册收录了1970年至1995年间对中日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条约、协定、协议、共同声明、会谈公报、政府要员谈话、新闻社说、评论、新闻报道、中日两国政党以及社会团体往来活动等有关文件。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基本文献书。

(5)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对1972年之前约20年间展开的中日两国民间经济交流的发展进行了追踪,并对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了考察。

^① 李玉:《给新中日关系的建议:环境、新人文主义、共生》,樱美林大学、北京大学合编2004年版,第347页。“因为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本研究经历了一段艰苦、迂回曲折的过程,80年代以后终于迎来了新局面。”

(6) 罗平汉《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事出版社, 2000年版)

该书以时间为顺序, 仔细分析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间中国对日政策的形成与变化。

(7)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 1945—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层面概述了战后 50 年间的中日关系。

(8) 黄大慧《日本的对中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的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年版)

对日本自民党、外务省、经济界等就对华邦交正常化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以及公众舆论进行了分析, 并解析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和特征。

通过对两国学者有关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后会发现, 中日学者对战后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的两国关系的研究, 其视角有着明显的差别。大多数的日本学者着眼于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的研究, 并且比较关注国际政治环境及美国的世界战略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制约。

一方面, 日本学者认为, 中日关系是与日本的对美外交有着深刻关联的政治问题, 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 1971 年中美关系的改善。然而, 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其分析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另一方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 中国研究者对“民间贸易→半官半民关系→邦交正常化”这种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图式持肯定态度, 强调民间贸易外交的成果, 并主张中国政府“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政策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尽管中国国内对“人民外交决定论”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但尚未出现具体的、实证性的否定性研究。

三 日本有关周恩来的研究

本研究的另一重点内容是关于中国对日外交的关键人物——周恩来的研究。日本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始于 1936 年的“西安事变”, 内容主要是周恩来的个人生平介绍及政治活动、发言的分析等。1939 年, 波多野干一所著《周恩来传》(《改造》19 卷第 7 号, 1939 年版) 问世, 这是日本

第一本介绍周恩来的传记。有关周恩来对日外交的研究，主要是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陆续发表的。其中有森下修一的《周恩来与中国的内外政策》（岛崎经济研究所，1973 年版）、米谷健一郎的《周恩来谈日本》（实业日本社，1972 年版）、高田富佐雄的《周恩来追求的日中复交》（《朝鲜评论》1972 年，第 136 号）等，这些论著主要分析了周恩来处理中日关系的原则和战略，并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的对日政策等进行了预测。

日本学者有关周恩来的学术性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开始的，并且大多数研究着眼于周恩来的生涯以及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其中就有松野谷夫所著《遥远的周恩来》（朝日新闻社，1981 年版）、柴田穗的《毛泽东的悲剧（第五卷）——周恩来的时代》（产经新闻社，1979 年版）、矢吹晋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讲谈社，1991 年版）。关于周恩来对日外交的著作主要是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人们所著，其中的代表作有《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里文出版，1991 年版）。这部著作是由 70 位曾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日本政界、财界、文化界、体育界以及艺术界人士共同撰写的回忆录，也是由一篇篇回忆战后中日民间交流、周恩来的人格以及会见发言等内容文章所组成的证言录。此外还有介绍周恩来与日本友人交往的著作，比如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著、王永祥编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朝日有声杂志，2002 年版）、周恩来著、矢吹晋编的《周恩来“十九岁的东京日记”——1918.1.1—12.23》（小学馆，1999 年版）、苏叔阳、竹内实所著《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产经出版社，1982 年版）等。

四 中国有关周恩来的研究

由于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周恩来本人的指示，在周恩来生前，中国国内几乎没有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尽管在 1949 年以前以及 1959 年左右，出版了几册周恩来的对谈录以及由周恩来的身边人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但中国有关周恩来的正式研究是从 1976 年的“四·五运动”之后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一）国家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共同研究

1979 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设立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其中也设立了“周恩来研究组”。其后，南开大学、中共中央党